

社会分层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

徐 臻^{1,2}

(1.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0065;2.四川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0101)

摘要:身份认同是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主观意识,身份认同中必然包含着客观社会结构信息。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主要考察了城市内部社会分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总体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的分层标准下都处于弱势地位。logit 检验发现,除文化资源外,经济资源、民权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分配对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弥合社会分层,消解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更加积极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社会分层;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1-0114-08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融入过程^[1-3]。而社会融入要求农业转移人口内化城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心理,在心理上形成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故可将身份认同作为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模糊化和矛盾性特征。具体而言,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自我身份表示说不清或没想过,明确觉得自己是城里人的不到两层。身份认同是个体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对自身所处社会位置以及自我身份的认知^[4-5],它是一种主观意识。而意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因此身份认同中必然包含着社会结构信息。从现实社会结构看,城市内部存在城市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们将其称为“新二元结构”或“城乡二元结构”^[6-9]。因此,研究社会分层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有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已有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归因解释,可以归纳为主体能力与制度环境两大方面。在主体能力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受关注的影响因素^[10-14]。一般认为,人力资本较高的人,找到的工作岗位相对较好,不仅收入较高,而且能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城市主流群体,受到的排斥也相对较少,进而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15]。考虑到中国社会注重社会关系的现实环境,社会资本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能更大^[10]。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积累表现出明显的同质性特征,尤其是在实质利益上,与城市居民交往有限^[3,13,16-17]。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同质性社会资本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固有的乡土观念与身份意识,阻碍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深层适应与心理认同^[3]。此外,个体物质条件也常被纳入主体特征加以考察,其中,收入是其主要衡量指标,但研究者们对于收入的影响是否显著以及影响路径并未达成一致^[12-14]。在制度环境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政

收稿日期:2017-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14XJY013),四川省教育厅“成都市域外户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研究”(14SA0015)。

作者简介:徐臻(1982—),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

府政策、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其中,二元户籍制度被认为是造成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主要障碍^[21-12,18-19]。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完成了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变,但在户籍身份上却未获得制度认可,造成他们身份认同的困惑。此外,由户籍制度衍生的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将农业转移人口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之外,使其成为事实上的非市民,加剧了身份认同困难^[19]。综上观之,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展开的,缺乏中观层面的观察,即对社会结构及其影响的考察。因此,本文研究社会分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

一 社会分层中农业转移人口阶层特征

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研究的是社会中各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均等分布,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及其分层标准^[20]。比如,据李春玲等人考察,在各类社会资源中,马克思强调了物质资料的重要性,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韦伯主张从财富、声望和权力三方面综合考察社会分层;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分配作为导致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戴维·格伦斯基等人归纳出构成社会分层基础的七种重要资源,分别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声望资源、公民资源和人力资源^{[21]5-6}。国内研究者也结合中国实践,提出划分社会分层的多元标准。比如,李强归纳分析了形成社会地位的十种资源^[20];陆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划分社会阶层^[22];李春玲将消费列为决定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23]。由是观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研究者们确定的分层标准不尽相同。本文将借鉴已有研究的分层标准,结合调研获取的信息,从经济资源、民权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特征与社会地位。

(一)经济资源分配中的有限性

经济资源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经济资源具有本原性,经济资源占用差异会引致其他资源分配的差异^[20]。多数研究者都将经济标准列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但是各自所侧重的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马克思关注的是作为生产条件的经济资源分配;韦伯强调的是市场地位,即通过市场交换可以得到的经济资源。为了综合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生活机会与经济地位,本文将主要通过财

产与收入状况来判断农业转移人口经济资源的占用情况。

虽然土地财产权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但是考虑到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程度较低,变现能力弱^{①[24]},在此主要通过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普通家庭最主要的财富来反映个人财产状况。我们的调研显示,仅有19.7%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租房而居或住在单位宿舍。从经济资源来源——收入看,工资收入是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积累经济资源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分别为5631元和3569元^{②[25-26]}。由于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在私营企业就业,且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半技术半体力劳动,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导致其占有的经济资源相对有限。我们在调研中获取的月收入数据充分支撑了这一判断。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农业转移人口的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高达86.8%。

(二)民权资源分配中的边缘化

民权资源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法律权利,即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二是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三是社会经济权利,如获得社会保障、物质帮助的权利^[20]。尽管民权应是社会各阶层的共享资源,由于赋权并不等于权力的实际行使、权益的自动实现,民权资源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均衡的。

从社会事务的参与看,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对农业转移人口几乎是封闭的。调研显示,66.3%的受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没有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在政治选举、工会活动、党团活动等社会活动中,参与率最高的是公益活动,其个案百分比也仅为10.0%,其次依次为街道办活动(8.9%)和选举活动(8.5%)。由此观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缺乏对自身利益相关的城市事务的话语权,而对自身利益表达的话语权缺失,又可能导致农业转移人口民权资源占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他们在社会保障领域同样表现出民权资源的占用不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5%左右,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5%以上^[27]。而我们的调研显示,31.7%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购买任何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也比较低,分别为48.3%、41.0%、25.5%、20.7%和

16.1%。可见,在城市社会中社会保障领域的分层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三)社会关系资源分配中的低质性

社会关系资源蕴含于人际关系结构中,它主要表现为个人或团体之间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关系资源在我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生活圈子等社会网络,调整着利益分配^[20]。个人可以借助其所处社会网络获得工作机会、物资支持、心理安慰等帮助。此外,社会网络还具有信息交流、文化娱乐等功能。

从调研情况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相对封闭,社会交往呈现出同质性态势。在被问及“您平时主要与哪些人联系和来往”时,69.5%的受访者表示家人是其主要往来对象之一;40.9%的人表示自己与老乡交往频繁;而在全部受访者中,与当地城里朋友保持经常往来的只有33%。可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主要是将原来在农村的人际交往圈移植到城市中来,而不是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居民重新建立的。这种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往往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能够获取的优质资源相对较少。

(四)文化资源分配中的矛盾性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较早地讨论了闲暇、服饰、古代遗风、宗教信仰以及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社会阶层的联系^{[28]1-9}。此外,布迪厄的文化分层研究探讨了阶级惯习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趣味之间的关系,以及趣味差异之于阶级建构的意义。由于我国城乡区隔的长期存在,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在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致使农业转移人口在进城后面临文化适应与行为转变过程。当农业转移人口的固有想法和习惯与城市情境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怎么做呢?调查发现,31.9%的人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习惯;22.5%的人能够接受这种差异,但适应起来比较困难;45.7%的人能够很快接受这种差异,并主动适应。可见,在城市文化适应中,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能够接受这种城乡差异,但在城市文化习得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惑。

(五)人力资源分配中的低端化

人力资源是劳动者因接受教育、培训等而获得的知识或劳动技能积累,它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职业培训经历等。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因人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别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自获地位”^[20]。从调研情况看,3.4%的受访

农业转移人口没有上过小学,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4.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2%,上过高中、中专、职高或技校的占30.4%,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仅占22.2%。由于进入城市前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的文化素质、技能储备整体不足,进城后的职业技能培训对他们而言显得尤为必要,但调研数据显示,40.7%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总体上看,在人力资源分配中,除体力优势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接受的技能培训较少,非农产业的工作经验也相对缺乏。

综上,在不同分层标准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都处于相对弱势。考虑到不同分层标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形成的社会分层组合往往并不一致,它们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方式及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各类资源分配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二 社会分层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一)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农业转移人口自行承担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的数据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每年需要自行承担1.8万元/人的生活成本,除少数人被纳入廉租房、公租房,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还需负担10.1万元/人的购房成本^[29]。经济资源的缺乏将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产生长期稳定预期。此外,若与城市居民经济差别过大,容易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心理上的“被剥夺感”,诱发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抵制性心理及行为^[19]。我们的调研也显示,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将经济资源积累视为成为城里人的重要条件。在被问及“成为城里人的条件”时,受访者选择在城镇购房和工作收入稳定的比例最高。故本文提出:

假设1:农业转移人口占有的经济资源越充分,越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二)民权资源分配的影响

民权是以公民身份为依托的法定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社会保障权利等。民权资源的占用不足意味着城市社会的政治空间、社会空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相对封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如果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居民,而与城市社会不发生或鲜有政治、社会联系的话,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形成市民身份认同。此外,民权作为公民的

基本权利,民权资源的缺失可能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上被建构为一类特殊群体^[16],造成他们身份认同困难。故本文提出假设:

2:民权资源占用不足将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

(三)社会关系资源分配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关系资源不仅具有物质帮助等安全网功能,还具有习惯、观念等交流功能。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面临职业、生活方式等的转型。与亲属、老乡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立足城市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我们调查发现,51.4%的受访者找工作主要依靠的是亲戚朋友的介绍。但是,这种同质性的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他们的乡土经验,强化着他们对自身传统角色的认知,不利于他们形成市民身份认同。相反,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有利于他们了解城市特性,积累城市生活经验。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以城市居民为指向的社会关系资源分配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

(四)文化资源分配的影响

城市具有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城乡文化差异可能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在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时产生的情境具有不可接纳性。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迁移,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移民,它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3]。如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适应能力较弱,或是与城市主流文化相疏离,容易造成心态上和身份上的边缘化。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4:对城市文化习得更好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五)人力资源分配的影响

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个体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差异。一般而言,人力资源储备相对较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多,他们不仅工作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而且在人际关系、文化习得以及社会事务参与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积极。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与城市居民的差异相对较小,受到社会排斥的情况也相对较少^[30]。这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宽松的人文生态环境,使他们更容易形成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

为了进一步把握各类分层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下文将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上述研究假设。

三 社会分层对农业转移人员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实证检验所用数据来自“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课题组2016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抽样城市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14个省区,抽样过程同时兼顾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转移人口集聚等因素,有效问卷共计1930份。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身份认同。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10,19],本文直接以受访者是否认同自己是城里人作为衡量其身份认同的指标。该变量为二分变量,数据来自农业转移人口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回答,如果受访者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赋值为1,其他则赋值为0。

结合前述社会分层标准与研究假设,各解释变量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根据资产价值周转的变现特征,经济资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变现能力较强的流动资产,一类是不易变现的非流动资产。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不足的现实,本文分别以月收入和城市房产来反映两类经济资源的占用情况。月收入为连续变量,数据来自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对自己平均月收入的回答。城市房产指标为二分变量,如果受访者在城里拥有自有住房,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其次,根据上文对民权资源的界定,本文主要通过“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险”两个变量来反映农业转移人口民权资源占用情况。调研发现,在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社会参与分层主要不在于多与少的区别,而在于有与无的差异;在社会保险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特征。因此,本文将“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险”变量都设置为二分变量,如果受访者在城市里参加过社会集体活动,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如果受访者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五险中,购买了至少一项社会保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再次,调研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交往对象仍以家人、老乡等同质性群体为主。因此,本文对农业转移人口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测量,主要是询问受访者:当地城里朋友是否是其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联

表 1. 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 logit 回归

身份认同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95% Conf. Interval]	
月收入	1.077979	.0339094	2.39	0.017	1.013525	1.146532
房产	2.042981	.3300015	4.42	0.000	1.488574	2.803873
社会参与	1.330309	.1947701	1.95	0.051	.9984544	1.772461
社会保险	1.364777	.2142332	1.98	0.048	1.003335	1.856425
社会交往	1.441474	.2027339	2.60	0.009	1.094186	1.89899
文化习得	.9511417	.0743784	-0.64	0.522	.8159848	1.108685
受教育程度	1.247648	.1007901	2.74	0.006	1.064949	1.461691
接受培训	1.263893	.2059407	1.44	0.151	.9183629	1.739428
性别	.8787997	.123062	-0.92	0.356	.667871	1.156345
年龄	1.088594	.0879493	1.05	0.293	.9291716	1.275369
婚姻	1.263818	.2238417	1.32	0.186	.8931486	1.788321
家庭迁移	1.314983	.2380128	1.51	0.130	.9222576	1.874944
户籍	1.783146	.2753313	3.75	0.000	1.317513	2.413342
_cons	.0201476	.0109036	-7.22	0.000	.0069753	.0581946

系对象。如果受访者回答是,赋值为 1,回答不是,赋值为 0。

然后,城市具有有别于农村的一套文化特质。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是在成年以后进入城市的,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与习得需要一个过程。故本文将以文化习得水平来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文化资源的占用情况。该变量为定序变量,数据来自问卷中对“当您的想法和习惯与城里人发生差异时,您一般会怎么做”的问题回答。在三个选项中,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习惯”的赋值为 1,选择“能够接受这种差异,但适应起来比较困难”的赋值为 2,选择“能够很快接受这种差异,并主动适应”的赋值为 3。

最后,教育和培训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前、流动后获取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为了测量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源占用,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两个变量:一是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该变量为定序变量,赋值为: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或技校=4,大专及以上=5;二是受访者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该变量为二分变量,在城市里接受过技能培训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此外,模型还将引入其他可能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受已有研究的启发,在微观个体层面,引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迁移模式等变量;在宏观环境层面,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性别、婚姻和家庭迁移模式均为二分变量,分别赋值为:男=1,女=0;单身(未

婚、丧偶、离异)=1,已婚=0;家庭化迁移=1,单人流动=0。年龄变量的赋值为:16 岁以下=1,16—22 岁=2,23—32 岁=3,33—42 岁=4,43—52 岁=5,53 岁及以上=6。户籍变量以受访者是否拥有城镇居民户口来衡量,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二)模型设定与回归估计

由于因变量是二值选择,因此选用 logit 模型。下文将利用 stata14 软件完成整个估计过程。首先对模型设定进行检验。非线性检验显示,连接检验的拟合值平方项($_hatsq$)不显著,表明模型设定大致无误。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对应的 VIF 值中最大值为 1.64,远小于 10,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logit 估计输出结果见表 1。最后,预测效果检验显示,模型的准确预测比为 81.92%。

(三)估计结果分析

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社会分层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充分,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小,越可能实现市民身份认同。

首先,经济资源分配的两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平均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转移人口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发生比会提高 7.80% ($p < 0.05$);在城里拥有房产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其发生比是没有房产的人的 2.04 倍 ($p < 0.01$)。可见,经济资源分配对农业

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说明经济上的富足带来的心理安全感、满足感促使农业转移人口更易形成对城市社会以及市民身份的认同。

其次,从民权资源看,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的 1.37 倍($p < 0.05$);在城里参与过社会活动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的人的 1.33 倍($p < 0.1$)。这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越充分,社会参与越积极,与城市的政治、社会空间联系越紧密,越可能实现市民身份认同,从而支持了假设 2,说明民权资源占用不足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身份认同的重要障碍。

再次,就社会交往变量而言,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中主要联系人是城里朋友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其他类型人口的 1.44 倍($p < 0.01$),即与城市居民往来密切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社会交往是积累社会关系资源的主要途径,相较于群体内部交往,与城市居民往来更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积累优质社会关系资源,这恰好说明社会关系资源占有越充分,越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3。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文化资源分配的回归结果与预期不符,假设 4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文化适应性的提升,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发生比反而出现小幅下降($p = 0.522$)。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文化资源分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具有双重影响:在人际互动中,人们往往以自我为参照,根据外人与自己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将其划入己群或他群^[19]。对城市文化习得较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异更小,在己群和他群比较中,更容易被城市社会接纳为“自己人”,自身也更容易形成市民身份认同。但另一方面,能够较好适应城市文化、行为方式的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预期可能更高,当现实境遇与理想生活出现明显落差时,梦想受挫的失落感会阻碍他们的身份认同。相反,对于那些一时半会还不能适应城乡文化差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城市文化对他们的冲击更多地体现为一场来自优越文化的洗礼,这反而有利于形成对城市的认同。

在人力资源方面,模型显示,受教育程度每提高

一个层次,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会提高 24.77% ($p < 0.01$),即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市民身份认同,这符合我们的观察与判断,支持了假设 5。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身份认同要好于未接受技能培训者,但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p = 0.151$)。究其原因可能是,现有技能培训没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限制了人力资源积累。调研发现,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的培训机会较少,40.7%的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培训内容也相对简单,多是一些基本的上岗技能,难以有效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地位。

此外,在一系列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迁移模式等个体特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在宏观制度层面,户籍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非常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具有城镇居民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认同市民身份的发生比是其他人的 1.78 倍($p < 0.01$)。

四 结论及启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市民身份认同困难将阻碍市民化的深化与完成。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主要从社会结构视角考察了社会分层及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社会中,城市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分层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资源、民权资源、社会关系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在不同的分层标准下,社会分层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社会分层中的低端处境阻碍着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

存在于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的延伸^[9]。建国后,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尤其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后,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这种既有的城乡差距被移植到城市内部,形成“新二元结构”。为尽快破解这种双重二元结构,党和政府先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但是政策的转变并不必然落实为行为的转变,考虑到制度累积效应的影响,为弥合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层,消解其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利影响,需要进行更加积极的制

度建设。

首先,从经济资源分层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资源占用不足主要表现在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尤其是住房资源匮乏,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负担不起购房成本。应该看到,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居住问题,住房改革从未间断,尤其是近年来,多项新政陆续出台,如提出实行购租并举、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等。目前多项新政已试点,其政策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其次,从民权资源分层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获取不足、社会参与的边缘化主要不在于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化待遇,而是源于制度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比如,我们调研发现,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农业转移人口为实现就业,往往不得不接受无社保待遇。因此,在后续的制度改革中,特别是在社保领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制度实施中的困难,广泛听取相关主体意见,深入把握他们的利益诉求,在制度与目标群体的互动中实现制度落地。

再次,在社会关系资源和文化资源分配中,营造良好社区环境或是可行途径。社区不仅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人际交往空间、社会参与平台,若能充分发挥社区的桥梁作用,无疑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由原初同质性群体向包含城市居民在内的更广范围扩展。此外,虽然在实证检验中,文化资源分配没有表现出对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显著影响,但是,通过社区建设,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文化适应,丰富其文化生活,显然是市民化的应有之义。

最后,在城乡教育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的背景下,进城后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调研发现,农业转移人口表现出较强的培训意愿,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愿意在业余时间参加培训学习,但他们实际获得的培训机会相对较少、培训内容也相对简单。受限于不高的务工收入,农业转移人口面临自费参加技能培训的现实困难。通过政府购买或补贴的方式,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或是有效办法。

注释:

- ①我们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土地处置方式的调研,也证实了当前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变现能力较弱。调研显示,进城后,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将名下土地交由亲属或亲友耕种,占比 62.4%;耕地被政府或集体收回的占 9.2%;抛荒的占 6.4%;转租给他人的占 18.9%;入股分红的非常少,仅有 1.1%;其他占 2.0%。
- ②文中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6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折算而来。

参考文献:

- [1]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J].人口与发展,2010,(4):73-85.
- [2]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5,(5):90-95.
- [3]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 [4]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 561 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2):86-106.
- [5]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 [6]武涛,史学斌.“民工荒”问题背后的思考[J].现代经济探讨,2005,(2):55-57.
- [7]侯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J].人口学刊,2007,(2):32-36.
- [8]顾海英,史清华,程英,单文豪.现阶段“新二元结构”问题缓解的制度与政策——基于上海外来农民工的调研[J].管理世界,2011,(11):55-65.
- [9]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4):59-62.
- [10]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1-24.
- [11]李荣彬,张丽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 106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2,(4):78-86.
- [12]侯亚杰,姚红.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J].人口研究,2016,(2):38-49.
- [13]王刘飞,王毅杰.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 893 份调查问卷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70-74.

- [14]杨菊华,吴敏,张娇娇.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J].青年研究,2016,(4):9-18.
- [15]杨菊华,张娇娇.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J].人口研究,2016,(4):3-20.
- [16]覃国慈.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的隔阂探讨[J].湖北社会科学,2007,(1):189-192.
- [17]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河北学刊,2011,(5):106-114.
- [18]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 [19]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5):141-160.
- [20]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J].学海,2006,(4):40-46.
- [21]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2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3,(4):1-9.
- [2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13.
- [24]许经勇.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演进轨迹[J].湖湘论坛,2017,(2):79-83.
- [25]国家统计局.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7569 元[EB/OL].(2017-05-27).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5/t20170527_1498372.html.
- [26]国家统计局.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42833 元[EB/OL].(2017-05-27).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5/t20170527_1498373.html.
- [27]人社部.社保覆盖全民 成就全球瞩目[EB/OL].(2016-12-14).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yaowen/201612/t20161214_261978.html.
- [28]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何志武,沈晓,编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 [29]章轲.城市蓝皮书: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 13.1 万[EB/OL].(2013-07-30).<http://www.yicai.com/news/2900674.html>.
- [30]胡平,杨羽宇.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60-65.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tatus Identity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XU Zhe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China)

Abstract: Status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As a kind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status identity must contain objective soci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c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status identity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general, the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is disadvantaged under all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 standards. Logit regression model found that except the cultural resources, economic resources, civil rights resources, social relations resources and human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tatus identity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order to bridg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liminate it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tatus identity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more proa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required.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status identity

[责任编辑:钟秋波]